



法治日报

星期一
2022年6月27日

环球法治

05
专刊

主编/赵阳
见习编辑/王卫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胜利

LEGAL DAILY

重振全球发展事业 推动2030年议程再出发 国际舆论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

环球聚焦

□ 本报记者 吴琼

6月2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以视频方式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会晤通过并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16年来,面对惊涛骇浪、风吹雨打,金砖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勇毅前行,走出了一条相互砥砺、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背景下举行的此次峰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为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政府自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积极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倡议凝聚国际社会共识

目前,全球发展事业取得积极进展,但也面临百年变局带来的空前挑战。更令人担忧的是,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日益被边缘化,发达国家援助义务远未落实,全球发展资源缺口巨大,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容乐观。在此历史关头,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它吹响了聚焦发展的“集结号”,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核心议程,倡议提出半年多来,有效凝聚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加快发展的共识,提高了发展议题在国际上的关注度。

全球多位政要指出,全球发展倡议凝聚了国际共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为国际社会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围绕全球发展倡议开展的讨论可以促进各国在发展领域取得进展。新西兰外长马胡塔指出,新方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具有战略意义,新方愿同中方一道就全球发展和安全作出共同努力。

包括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在内的全球多位学者称赞全球发展倡议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力回应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期盼和追求。他们认为,这也是倡议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响应的原因。目前,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对全球发展倡议表达了积极支持态度,50多个国家加入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路易斯·保利诺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说,聚力发展、合作和团结,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图为在印度浦那市,工人在中国海尔集团工业园厂房内工作。

的共同心声。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主题与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契合,能够凝聚共识、强化多边合作机制。

积极搭建发展合作平台

国际舆论指出,全球发展倡议铺设了促进发展的“快车道”,为各方对接发展政策和深化务实合作搭建了有效平台。

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关注到,全球发展倡议已由理念转化为实践,积极搭建项目合作平台,推动相关项目落实落地取得重要进展。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先后举办可持续发展论坛、乡村发展高层论坛、全球滨海论坛等,促进国际社会在有关领域的交流合作。

国际舆论还指出,6月20日《全球发展报告》的发布是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一项重要举措,将为各国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为全球发展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多家媒体评论称,《全球发展报告》梳理了2030年议程落实进展与挑战,旗帜鲜明地指出,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国际社会应当更加聚焦发展合作和全球伙伴关系建设,迎接数字变革和绿色转型,实现人类共同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印度前驻华大使南威哲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解决粮食安全、新冠疫情、发展融资、气候变化和绿色

等重要会议的举行,为全球发展注入了更多力量。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在他看来,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实现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

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近日表示,土方积极支持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探讨具体参与措施,形成国际合力。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与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总干事雷斯特雷波对于全球发展倡议表示高度赞赏。他说:“全球发展倡议强调绿色发展,这在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全面挑战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愿与中国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加强合作,让更多的成果造福世界。”

推动倡议走深走实

国际舆论指出,全球发展倡议提供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加速器”,为汇聚各方资源、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协同增效注入了强劲动力,将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推动2030年议程再出发。

包括古特雷斯在内,全球多位政要均认为,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局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将有力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发展,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多国政要还称赞中方率先制定

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方案,发布多期进展报告,向世界无私分享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卢沛赫指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对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倡议和举措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相契合,将有助于实现稳定、促进发展、巩固和平,确保国际社会践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目标”。

俄罗斯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谢尔盖·萨纳科耶夫注意到,中国国家领导人强调,中国愿同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稳步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表示,印尼欢迎全球发展倡议并愿积极参与倡议。卢胡特还称,印尼和中国可以合作战胜疫情,实现更大发展,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国际舆论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发展倡议为各国聚焦发展、团结发展、共同发展提供行动指南,注入思想动力,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各方应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快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编者按

5月28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贾桂德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国际法形势和我国外交条约法工作》的主旨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影响,指出国际法领域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线。本文是主旨报告的节选,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

从国际法视角看当前国际形势

□ 贾桂德

当前,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中美博弈、乌克兰危机交织激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已经并将进一步产生广泛深远影响。国际法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线,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政治安全博弈加剧,安全议题重要性上升

围绕“不使用武力”原则,俄罗斯与西方各执一词。俄罗斯提出乌东地区民族自治权,避免发生种族灭绝等多项理由,并主张西方违反北约不东扩的承诺,俄动武是为抵御西方安全威胁而采取的先发制人行动,属于依据《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西方国家则将俄动武定性为“侵略”,要求通过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追责。

安全议题在全球议程中重要性上升。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脑死亡”的北约满血复活。近期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欧洲多国调整国防政策,德国大幅提升军费预算,法国提出构建“欧洲军”。俄乌冲突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平息尚未可知,可以确定的是将对欧洲安全框架产生重要影响,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不容低估。美国推动北约东扩,还发布所谓“印

太战略”,搞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等。这些“小圈子”给世界和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酝酿变革,单边制裁非法性进一步凸显

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改革步履维艰。主要大国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推进区域经贸规则建设。二十国集团(G20)能否继续引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面临新的挑战。日前,美国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不关心地区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没有关税豁免、市场准入等安排,而是强迫各国接受美国所谓的高标准,为推进其自身地缘战略服务。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公共产品武器化的种种行径,削弱了全球化底层逻辑。各国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国金融系统的弊病进一步暴露,刺激了货币体系“去美元化”进程。中国作为国际稳定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刚刚批准调整特别提款权货币权重,人民币的权重上升至12.28%,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权重均相应下调。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制裁不断升级,进一步增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使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单边制裁违法性及严重后果。从国际法角度看,相关制裁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国家还滥施“长臂管辖”,威胁第三国配合落实制裁,明显违反国际法。同时,冻结俄央行资产甚至讨论国内立法对冻结的俄央行财产予以没收处置,破坏了主权平等、一国央行财产豁免等重要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危害性不容小觑。

三、国家集团阵营分化,可能加剧国际法碎片化

受疫情影响,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弱。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全球供应链遭受冲击。个别国家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界,挑动所谓民主国家对权威体制的叙事之争,甚至无理指责中国对国际秩序造成长期挑战,加剧国际社会阵营分化。

国际社会阵营分化导致大国协调难度加大,全球统一规则的制定实施面临更大困难,分领域菜单式合作更加受到青睐,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

四、非传统安全领域危机叠加,新兴领域规则制定更显紧迫

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短板亟待

完善。俄乌冲突造成新一波难民潮,进一步放大大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严峻挑战。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依旧严峻,欧洲对俄能源实施制裁导致反噬,完成预定减排目标面临更大困难。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

西方虽未直接介入俄乌军事冲突,但在网络、外交、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给予乌强力支持,与俄进行激烈交锋。上述领域涉及诸多现有国际规则的模糊或空白地带,包括网络空间国际法的适用、非国家行为体行为规范和责任归属等,凸显相关领域规则制定的紧迫性。

最近,有西方大国领导人公开表示,世界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要主导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变革涉及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利设置,并将继续推动国际法体系加速演变,在国际法体系发展演变进程中,我们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结合外交条约法工作实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风险挑战,为外交决策和行动提供及时、有力的法律支撑,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 本报记者 苏宁

近日,日本最高法院对福岛核事故灾民要求国家赔偿的4起集体诉讼案作出统一判决,判决结果认定政府对核事故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福岛核事故以来,共有约1.2万名核事故灾民发起约30起集体诉讼,要求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分别进行赔偿。此前,日本最高法院已经在数起集体诉讼案中对东京电力公司作出承担赔偿责任的终审判决,此次是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对政府在福岛核事故中是否负有赔偿责任作出终审判决。业内人士指出,本次判决结果将对其他类似案件的判决产生巨大影响。

政府无需赔偿

本次判决是日本最高法院对千叶县、福岛县、群马县及爱媛县4起集体诉讼案作出的统一终审判决,判定政府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据日本媒体报道,在二审阶段,上述4起集体诉讼案中,除群马县外,另外三地高级法院都作出政府应当负有赔偿责任的判决,但在最高法院的庭审中,4名法官中有3名认为政府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政府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日本最高法院审判长菅野博之认为,由于地震和海啸的规模大大超出了预想,即使政府事前要求东电公司采取了安全对策,很大程度上也不会避免核事故的发生。

针对最高法的判决,日本媒体、舆论质疑之声四起。大阪公立大学教授除本理史认为,最高法院没有提及海啸的可预见性,是刻意规避。《福岛民友》也在报道中指出,最高法对海啸的可预见性避而不谈,对此,多数核事故灾民认为“法庭对有必要检讨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回避”。

明治大学教授胜田忠广认为,如果当初政府要求东电公司采取防范措施,至少事故灾害范围和程度将会减小,最高法“假定”政府履行了义务,但对“假定”情形又无法作出准确的数字模拟分析,轻易得出事故不可避免的结论,令人吃惊。这一判决将会加深民众对政府核电政策的不信任感。

面对如此判决结果,原告方纷纷表示不服和难以接受。千叶诉讼案的原告代表福岛县南相马市避难者南原圣寿表示,政府不仅不采取对策措施,还认为发生核事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很过分。

福岛诉讼案原告代表熊井利治表示,判决太可笑了,原告团体应以此为契机加强团结,为救助避难者继续斗争。

福岛诉讼案原告代理律师马奈木严太郎表示,最高法难道认为政府不作为也可以吗?我们不能接受。

另据《福岛民友》报道,21日,福岛诉讼案原告代表团在福岛市集会,征集原告,准备向福岛地方法院追加诉讼请求,在原有1150名原告的基础上,争取募集10000名原告,再次向政府和东电公司提出赔偿诉讼。

灾民生活艰难

此次4起集体诉讼案涉及原告方人数近3700人。随着最高法终审判决生效,东电公司将单独承担对原告方灾民的赔偿责任。根据此前最高法的判决,赔偿总额为145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000万元),这对灾民损失而言可谓杯水车薪。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事故导致放射性物质扩散,大量灾民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艰苦的避难生活。至今事故已经过去11年多,但仍然有约3万避难者无法返回家园,被划定为“返还困难区域”的禁区达337平方公里。

由于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当地声誉恶化,即使在个别完成放射性物质清除工作的“复兴据点”区域,恢复正常的农业生产生活仍然面临巨大困难,避难者返乡意愿低,据媒体报道,在不久前刚解除禁令的一处“复兴据点”区域,全部30户82人中,仅有4户8人有返乡意愿。

避难者认为,尽管最高法作出了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但政府对灾区复兴重建应负的责任不能减少。福岛县避难者吉田幸惠表示,长期避难生活身心疲惫,重返家园需要政府在清除放射物、建筑施工等多方面的支持,东电公司能力有限,希望政府也承担复兴的责任。

另外,福岛核事故避难者集体诉讼案中,目前已经有7起经最高法判决确定了东电公司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都超过了政府的赔偿标准。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为使所有受灾民众都得到公平公正的政府赔偿,应当尽早修改提高有关核事故赔偿的政府标准。

福岛县知事内堀表示,今后将继续呼吁政府在福岛复兴重建、核电站报废处理等方面负责到底,并强调将要求政府尽快研究提高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的政府标准。

排海广受批评

福岛核事故灾民救助,灾区复兴重建需要日本政府的责任与担当,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在核事故的善后工作方面,特别是在核污染水的处理问题上,更需要日本政府拿出责任与担当,以负责任的态度,放弃核废水排海,寻找妥善处置办法。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批准东电公司将核废水经过滤稀释后排入大海,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日本媒体曾经披露,日本所谓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的性能并不稳定,除氚外,曾在已过滤的核废水中发现其他多种严重超标的放射性物质,环保组织也多次警告称核废水一旦排入大海将对海洋生态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多个邻国国家指出,日本政府作出该决定时并没有和邻国进行协商,也未提供任何相关资料,这种行为无疑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要求日方同相关组织和国家一起寻找核废水的妥善处置办法,在此之前,不得擅自启动核废水排海。

然而,日本政府对这些质疑与担忧置若罔闻,仍然一意孤行,决定从2023年春天开始排海工作,目前已经启动了排海的相关施工建设项目。

受核事故影响,福岛县的水产、农林等支柱产业深受打击,产量和销量的恢复尚需数年时间,目前仍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福岛产食品保持进口限制。福岛县当地渔业团体坚决反对核废水排海。一旦实施排海,福岛县水产品、农产品的声誉必将进一步恶化,当地经济的复兴也必将遭受进一步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对企业负有防止事故发生的监管义务,事故发生之后,更考验政府的责任与担当。此次判决否定了政府的赔偿责任,但政府对避难者的赔偿及援助政策不应发生倒退,对事故善后的责任心不能缺失。



图为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内拍摄的核废水储存罐。 新华社发